

華南新石器時代文化 的領先性與滯後性初探

黃崇岳

本文所論及的華南，主要指廣東、廣西和江西地區。這些地區早在十餘萬年前，就有廣東曲江「馬壩人」，四萬年前有開封「桐中岩人」，廣西的百色盆地和江西贛江流域的樂平、義安等地，均發現有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廣西的「柳江人」、「麒麟山人」也早已露面。這說明在新石時代以前，華南地區有著人類祖先活動的漫長歷史。至距今一萬年前後，地質學上的全新世時期，從這裡率先開始新石器時代「革命」，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

新石器時代是繼舊石器時代之後，人類從完全依賴自然的攫取經濟向改造自然的生產經濟轉化時期，是一次歷史性的飛躍。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V.G. Childe)在1928年初版的《遠東東方的新線索》一書中，稱之為「新石器革命」，是人類歷史上自學會控制火以來的一次「最偉大的經濟革命」。因此新石器時代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承上啓下的關鍵時期。研究它的發生、發展和特點，對闡明中華文明起源和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縱觀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材料，將華南地區與中原地區發達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對比，我們就會發現一個重要現象，華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起源早、發展慢、結束晚，即具有早—慢—晚的特點。這種特點以致影響到這一地區先秦社會歷史的發展。那麼，它的表現形式和形成的原因何在？本文擬作初步的探討。

一 十年前的疑惑與預見

十年前，筆者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講授中國考古學、民族學和先秦史學，在教

學與研究的過程中，較多接觸中原地區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發達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材料，它們是七十年代以前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賴以旋轉的軸心。至七十年代中後期，學術上才有新的突破，發現了早於仰韶文化上千年，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遺址^①和河南新鄭裴李崗文化遺址^②。主持裴李崗遺址發掘的鄭州大學歷史系李友謀先生堅持認為，裴李崗文化早於仰韶文化，應屬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筆者不敢苟同。裴李崗文化遺址中發現大量磨製精緻的石斧、石鏟、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農業生產工具，還有陶甕、各類陶器和豬的骨骼、豬羊陶塑，特別是墓葬中有男女社會分工的現象，男人隨葬石斧、石鏟、石鐮等農業勞動工具，女人隨葬磨盤、磨棒、紡輪、陶鼎等家庭勞動工具。由此判斷，當時已進入鋤耕農業階段，其原始農業、製陶業、畜牧業和定居生活，已達相當的發展水平，非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所及，應視作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為宜。

反觀華北和中原地區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有山西沁水下川遺址C14測定年代距今23,900—16,400年之間(ZK417、385)，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遺址距今 $18,865 \pm 420$ 年(ZK136—0)，河南安陽小南海洞穴遺址距今 $13,0775 \pm 220$ 年(ZK170—0)等。換句話說，中原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下限至距今13,000年左右，與裴李崗文化之間還有五、六千年的空白，這就是孕育中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年代。可惜盼望至今，中原地區尚未發現此類文化遺址，豈不令人疑惑與遺憾！

筆者1985年冒昧草就「試論『磁山、裴李

Huang Chongyue : Director, Shenzhen Municipal Museum, China

黃崇岳：深圳市博物館館長

尚文化』的時代與社會性質—兼論我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一文，依據廣東封開黃岩洞、廣西桂林甌皮岩和江西萬年仙人洞等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的材料，提出在距今近萬年左右的時期，隨著最後一次冰期的結束，地球由更新世轉入全新世，大部分地區變得更為溫暖濕潤，正是原始農業發生的理想時期，從舊石器時代發展至新石器時代，新的社會變革的到來，是合乎規律和可以預料的。「南方洞穴遺址的材料表明，我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遺存，應到全新世初期一萬年以上的地層中去尋找。」⁶¹

當時筆者已預見到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領先性。但因長期在北方工作，對華南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緩慢問題不甚了了。近年回廣東工作，接觸到一些新石器時代的材料，對其滯後性問題，才有所醒悟。

二 早期的領先性

迄今為止，中原地區尚未發現超過八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存在明顯的缺環。目前對這一情況只能作兩種假想：其一是機會未到，未及發現，寄希望於未來；其二是受客觀條件的限制，確實不存在，成為永久缺陷。無論如何，只能等待歷史的檢驗。

國內外學者，一般都把磨製石器、發明陶器、原始農耕和飼養家畜，作為新石器時代開端的四大條件和標誌。其中原始農業的產生，是根本條件和基本動力。

結合我國考古學和民族學材料，我們認為，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具有如下特徵：

- (一) 遺址範圍較小，文化層較薄，內涵較簡單。人們或居近水山洞，或住靠河山崗。文化遺存或單獨存在，或疊壓在早期之上，晚期之下。
- (二) 生產力水平較低。原始農業處於萌芽狀態，園圃式地種植薯芋，或刀耕火種生

產穀物，採集和狩獵仍有重要經濟地位。畜牧業處於早期野牧或人畜同居階段，家畜有豬、狗、羊等少數品種。

- (三) 舊石器時代文化的殘餘較多。石器以打製為主，磨製較少，只磨刃口，少見通體磨光者。主要器型有適於發掘和刀耕農業的砍砸器、石斧、磨盤和骨蚌器之類，不見較大型的石鋤、石鏟、石鐮和骨耜之類的耨耕農具。漁獵工具大量存在，有獸骨和貝殼等堆積。
- (四) 陶器較原始。製陶技術處於手製陶坯和露天燒造階段，不見陶甕。器形較簡單多為夾砂圓底釜、罐類器以及手捏的杯、盤、碗等小容器，少平底、圈足、帶把、帶流等複雜器型。多素面或施細紋、劃紋、籃紋等簡單紋飾。陶器色澤不勻，厚薄不均，火候較低，質鬆易碎。也有不見陶器，只見磨製石器的「前陶新石器文化」。
- (五) 居住條件簡陋。人們住在山洞、半穴式小房子、窩棚或干欄式木房。這是與群婚家庭或帶群婚殘餘的早期對偶婚家庭相適應的。
- (六) 墓葬較整齊單一。隨葬品較少，不見貧富分化和男女社會勞動分工現象。死者葬在室內或室外，不見成年男女合葬墓。這些特徵互為條件，互相聯繫，要全面考察，忌孤立分割。

根據上述特徵，華南地區已發現多處可靠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洞穴文化遺址。其中年代最早者為廣東陽春獨石仔遺址上文化層，出土貝殼經C14測定年代距今 $14,900 \pm 300$ ⁶²，突破了一萬年大關，令人矚目。與之年代相近的有廣東封開黃岩洞遺址⁶³，廣東英德（原屬翁源）青塘墟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黃門岩等遺址⁶⁴。還有廣西柳州白蓮洞遺址上文化層，經C14測定年代距今 $12,900 \pm 150$ 年（樹輪校正為 $11,400 \pm$ 年）⁶⁵，亦在萬年以上。這些遺址的共同點是疊壓在舊石器晚期文化層之

上，打製砍砸器與磨製石斧、石鏃並存，以打製石器為主，磨製僅及刃口，有大量的螺蚌殼和獸骨堆積。其中陽春獨石仔、封開黃岩洞和柳州白蓮洞遺址均發現穿孔礫石，英德青塘遺址還發現火候不高的夾砂粗陶和泥質軟陶片，手製，施於繩紋、編織紋等。可見當時人們在繼承舊石器時代採集和狩獵經濟生活的同時，已開始栽種塊根植物薯芋之類，並可能從事刀耕農業。砍砸器、石斧、石鏃可用於砍伐樹木，穿孔礫石可安裝在掘土棒上當「重石」，方便刀耕農業中挖土點種，如南非布須曼人耕作的方法¹⁰¹。至於陶片的發現，更是用於炊煮糧食作物的佐證，陶器是伴隨農業產生而出現的，古書中關於「神農氏耕而作陶」(《太平御覽》卷833引《周書》)的記載，決非偶然。華南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再往前發展，就到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廣西桂林甌皮岩洞穴遺址¹⁰²和江西萬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遺址¹⁰³。該兩遺址相距幾千里，但文化內涵頗多相似之處，如打製與磨製石器並存，有火候不高的夾砂粗陶片，有穿孔礫石，有螺堆積等。唯甌皮岩遺址的文化內涵更為豐富，發現有墓葬和豬骨骼等。

上述廣東、廣西、江西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可以說明在全新世之初，距今一萬年左右，人類已從舊石器時代邁進新石器時代的門坎。而中原地區至今仍未見這一時期的遺蹟，華南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領先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 中晚期的滯後性

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在相同或不同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中也是不平衡的。隨著新石器時代的向前，當進入中、晚期鋤耕農業之後，一度領先的華南新石器時代文化，則放慢了步伐，與中原地區的七、八千年至四、五千年前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相比較，表現出明顯的滯後性。

河南發現的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崗文化¹⁰⁴，具有分佈廣、內涵豐富、發展水平較高的

特點。這類文化遺址比較集中於河南中部，豫南、豫西、豫北也有發現，有五、六十處之多。經發掘的重要遺址有新鄭裴李崗、密縣裴溝北崗¹⁰⁵、舞陽賈湖¹⁰⁶等七、八處。其中賈湖遺址時代比裴李崗遺址更早，距今8000年左右，面積達55,000平方米，有相當的村落定居規模。發現有圓形或橢圓形半地穴房基30多座(單間、雙間至三、四間相連)，陶窯10座，墓葬300餘座。石器以磨製為主(有些通體磨光)，有斧、鏃、鏹、鏹、磨盤、磨棒等典型的鋤耕農業工具。有豬、狗、鹿等動物骨骼。陶器有夾砂和泥質的罐、鼎、壺、鉢等。骨器有鏢、鏃、針、鏹和笛等。骨笛有七孔，經專家測試最少有六聲音階，也可能是七聲俱全，這是音樂史上的重要發現。值得注意的是，在龜甲、獸骨和陶器上有刻劃符號，如「日」等，符號有單個也有幾個相連，或一個符號多次重複的，如有五個「乙」形符號在兩個探方內出現。發掘者認為這與商代甲骨文和中國的文字起源有一定的關係，「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質」。由此可見，隨著農業定居而來的中原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一斑。至於距今五、六千年的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比之裴李崗文化更為進步。經發掘的著名的西安半坡遺址¹⁰⁷和臨潼姜寨遺址¹⁰⁸，均已形成五萬平方米以上的固定村落，村裡分居住區、陶窯區和墓葬區，大、小房子排列有序，小房子裡有石器(斧、鏹等)、骨器、陶器、火塘和儲糧窖穴，有粟和蔬菜等農作物，頗有對偶婚家庭的氣息。它尤以大量輪製的精美的彩陶器稱著於世，故又有「彩陶文化」之稱。值得注意的是，村落周圍繞以壕溝和哨所，活現出血緣氏族、部落聚族而居的繁榮景象。

華南地區同一時期的新石器時代中文化，無論是山崗、臺地、貝丘或沙丘遺址，其發展規模和水平均落後於中原地區。深圳的新石器時代沙丘遺址，分散在海灣靠近山崗和溪流的沙丘上，規模較小，文化層較薄，內涵簡單。如距今6000年左右的大黃沙文化遺址¹⁰⁹，出土石器有斧、鏃、拍、礪石、敲砸器等，以磨製為主，還有少量打製者。陶器有釜、罐、盆、鉢、器座等，夾砂陶佔80%以

上，施繩紋、弦紋、劃紋等簡單紋飾，採用手製加慢輪修整，火候不高，色澤不均。少見住房遺跡和墓葬，似非長期定居的遺址。類似的文化遺址有深圳咸頭嶺、小梅沙、珠海澳灣、後沙灣，香港深灣、東灣等沙丘遺址。如果說沙丘遺址以漁獵經濟為主，相對落後，那麼，華南的山崗或臺地文化遺址的狀況又如何呢？

廣東曲江石峽文化遺址⁽¹⁷⁾，在獅頭與獅尾兩山之間的峽谷地帶，可以作為山崗和臺地遺址的代表。該遺址可分為上、中、下三個文化層，自四、五千年前延續至二千多年前，是一部難得的華南地區原始社會晚期的歷史教科書。上文化層的遺物，以廣東通常所謂「夔紋、雲雷紋和方格紋組合的印紋硬陶」與少量的磨光石器、青銅器(鋌、鏃、簋、刀)共存為特徵，年代相當於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文化層的遺物，以廣東通常所謂「曲尺紋、長方格紋組合的印紋軟陶」與較多的磨光石器共存為特徵，年代相當於夏商之際。下文化層的遺物，以泥質磨光陶、夾砂陶與大量的磨光石器共存為特徵，出土有盤鼎、釜、三足盤、圈足盤、豆、夾砂罐、釜等殘片，還有殘石鏃、石鏃、石鏃、礮石及較完整的梯形石鏃、石鏃、石鏃、石鏃、紡輪等，以有段石鏃、扁薄體鏃、鋌及平底盤式鼎為特色，年代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四至五千年。開口於下文化層的一、二、三期共64座墓葬，除出土上述下文化層的器物外，第三期墓中有一定數量製作精美的裝飾品，如琮、璧、環、環、玦、璜、斧、珠、管和玉片等，還有石鏃和碳化物。這些都表明耨耕農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儘管如此，若將下文化層的「石峽文化」與中原地區四、五千年前的龍山文化相比較，前者的滯後性就一目了然。類似石峽文化的遺址在華南地區比較罕見，而晚於中原仰韶文化的龍山文化遺址，則遍及陝西、河南、山西以至山東、湖北等地，可見當時人類社會共同體已不斷擴大，有部落聯盟甚至王國的蹟象。其石器、陶器、骨器等的發展水平不再贅述，而作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

之一的龍山文化城址遺址，僅在河南目前就已經發現了四座，即安陽後崗、登封王城崗、鄆城郝家臺和淮陽平糧臺遺址。其中距今4000年左右的淮陽平糧臺城址⁽¹⁸⁾，平面呈正方形，邊長185米。城牆夯築，南北各有一城門，南門側有對稱的門衛房，中間路上下埋有三條陶水管道，城內發現有房基、高臺、陶窯、墓葬、灰坑、作坊和煉銅渣等遺蹟，房基上普遍用土坯作建築材料(我國土坯建築淵源於此)。該城址用灰坑出土的木炭作C14年代測定距今4355±175年。眾所周知，城堡是由原始社會進入階級社會的重要象徵，預示著在四千多年前，中原地區將由石器時代進入青銅時代，由野蠻邁向文明。而石峽文化遺址的發掘表明，在粵北地區石器時代的下限，一直延續到西周至春秋時代，比之中原地區滯後了一、二千年。

當中原地區於公元前21世紀建立了夏王朝之後，經過商代和西周，發展成強大的奴隸制王國，創造出文字和燦爛的青銅文化。而華南地區卻仍處於漫長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向青銅時代過渡階段，直至春秋戰國才最後完成。深圳市大梅沙春秋晚期遺址⁽¹⁹⁾，發掘10座墓葬中有6座隨葬青銅器共11件(劍、矛、斧)，只見小型兵器，不見中原商、周墓出土的大型禮樂器和車馬器。深圳市疊石山遺址⁽²⁰⁾，在「夔紋陶類型」的文化層中，發現磨製石器(鏃等)、青銅器(鏃等)和鐵器(斧)並存的現象，經C14年代測定距今2250±110年(經樹輪校正)，相當於戰國中晚期。這大概是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尾聲，也是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先聲。

由「百越」雜處的華南地區，至秦統一之前，由於經濟落後，做成政治和文化的落後，仍處於各部落王國的紛爭階段，難於形成統一的政權，被經濟、政治和文化高度發展的中原王朝，視為「蠻夷」之地，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 發展不平衡性探源

經過與中原地區的橫向比較，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領先性與中晚期文化的

滯後性，發展不平衡性，便明顯地反映出來。那麼，產生這種不平衡現象的原因何在？我們認為其根源在於原始經濟的發展狀況，主要又在於原始農業發展的快與慢。

華南處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山崗林立，河流縱橫，森林茂密，為野生動植物的生長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環境，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採集和狩獵經濟得以高度發展，同時也為向早期原始農業和畜牧業過渡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在原始採集經驗積累的基礎上，隨著全新世氣候的變化，最初的原始種植業便在靠近山崗和河流的地方應運而生。農史學界一般都認為原始農業最早發生於山地。溫暖濕潤的華南山地得天獨厚，擁有早期農業的優勢，而中原和華北平原地區卻處於劣勢。正如前述，在華南地區發現多處迄今我國年代最為古老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出現了原始農業工具和蹟象，是合乎規律和可以理解的。

結合國內外考古學和民族學材料，原始農業最先始於無性繁殖的塊根植物的種植，即薯芋類糧食作物。它們耕作粗放，產量高，炊煮快(燒烤即熟)，人們早在舊石器時代就作為採集對象，逐步積累起儲存和種植經驗。起初種植薯芋是圍圃式的粗放耕作，在山洞或山崗的住地周圍，用打製石器或木棒作工具，掘地而種，簡單方便。我國臺灣高山族，以及筆者曾作過調查的雲南景頗族、怒族、獨龍族、拉祜族還殘存原始刀耕火種農業，而他們最早也栽種薯芋類作物。他們採用燒烤薯芋的辦法，解決熟食問題，這大概是「前陶新石器文化」遺址存在的原因。

隨著原始農業的發展，人們逐步學會栽種稻、粟等穀物，其發展過程可以分為刀耕、鋤耕和犁耕三個階段⁽¹⁾。刀耕農業起源於山地，人們將山林樹木砍倒燒光，用木棒(或戴上穿孔礫石作「重石」調節掘洞深淺)點種穀物，不除草施肥，天生天養。由於農作物產量低，地力消耗快，故人們不得不出狩獵與採集，補充食物的不足，並不時遷徙，另覓新地開發。同時發明陶器以解決穀物的炊煮

問題，用手製陶坯，露天燒造。前述華南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與圍圃式種植薯芋和早期刀耕農業的地理環境，造成其原始農業率先發展，形成早期文化的領先地位。

當進入以使用石鋤、石鏟翻地種植穀物為特徵的鋤耕農業之後，中原的崗地和平原地區，肥沃疏鬆的黃土，便發揮出農業生產的新優勢。由於其鋤耕農業的迅速發展，便推動了村落定居、家畜飼養和製陶、紡織等原始手工業的相應發展。這就是我們所見到的中原新石器時期的繁榮景象。這時華南山地從原來開創刀耕農業的優勢，轉化為發展大規模鋤耕農業的劣勢，直至四千多年前的石峽文化，才見到較多的石鏟、石鏟等鋤耕農業工具。一些貝丘和沙丘文化遺址，人們似乎還過著以漁獵為主的流動生活，其文化的發展和規模水平，當然與中原地區無法倫比。

綜上所述，通過對比，由於自然條件的差異，原始農業產生有先有後，發展水平有高有低，便形成了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總體上有早一慢一晚的特點。早在初期，慢在中期，晚在後期，比之中原地區落後了一、二千年，呈現出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這就給華南先秦時期的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誠然，華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文化發展本身也是不平衡的，江西比兩廣地區較先進。特別是江西新贛商代大墓出土大批精美的青銅器，舉世矚目，將改寫長江以南古代的局部歷史。這種異軍突起的複雜情況，應另作別論。

註釋

- (1)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遺址試掘〉，《考古》，1977年第3期。〈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
- (2) 開封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南新鄭裴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

- 古》，1978年2期。〈裴李崗遺址一九七八年發掘簡報〉，《考古》，1979年第3期。
- (3) 黃崇岳：〈試論「磁山·裴李崗文化」的時代與社會—兼論我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載《論仰韶文化》文集，《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 (4) 邱立誠等：〈廣東陽春獨石仔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發掘〉，《考古》，1982年第5期。
- (5) 邱立誠等：〈廣東黃岩洞洞穴遺址〉，《考古》，1983年第1期。
- (6)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翁源青塘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 (7) 周國興：〈白蓮洞遺址的發現及其意義〉，《史前研究》，1981年第4期。
- (8) 宋兆麟、周國興：〈原始掘土棒上的穿孔石〉，《農業研究》，第五輯，1984年。
- (9)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桂林甌皮岩洞穴遺址的試掘〉，《考古》，1976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等：〈石灰岩地區¹⁴C樣品年代的可靠性與甌皮岩等遺址的年代問題〉，《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
- (10)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萬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遺址試掘〉，《考古學報》，1963年第2期。〈江西萬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文物》，1976年第12期。
- (11) 李友謀：〈裴李崗文化發現十年〉，《中原文物》，1989年第3期。
- (12) 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密縣我溝北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河南文博通訊》，1979年第3期。
- (1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2—6次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1期。
- (14)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 (15) 西安半坡博物館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 (16) 深圳博物館等：〈廣東深圳市大黃沙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00年第11期。
- (17) 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曲江石峽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7期。
- (1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陽平糧臺龍山文化城址試掘簡報〉，《考古》，1983年第3期。
- (19) 深圳博物館：〈廣東深圳大梅沙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3年第11期。
- (20) 深圳博物館：〈深圳市壘石山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11期。
- (21) 李根蟠、黃崇岳、盧勛：〈中國原始社會經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154-162。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Leading and Backwarding Characters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 of the Hua'nán Region

Huang Chongyue

[Abstract]

Hua'nán, a geographic subdivision including mainly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Guangdong, Guangxi and Jiangxi, shows vestiges of human activities as early as the Palaeolithic era. It appears to be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that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 stemming from the cultural accumulations of the Palaeolithic period had started from here about 10,000 years ago. The Neolithic culture in Hua'nán is distinct from that in the Central Plain by having an early derivation, a slow growth and a tardy ending. A research into the leading and backwarding characters of this culture may help to elucidate the disequilibrium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The leading-character of early Neolithic culture in the Hua'nán region is evident. Remains from early Neolithic cavern-cultures of 10,000 years ago were uncovered from a number of sites in Guangdong, Guangxi and Jiangxi. In contrast with this, no Neolithic sites with similar culture and dating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the Central Plain.

The middle Neolithic period saw the lagging of Hua'nán's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sites are relatively small in size; artefacts primitive and backward; fishing-hunting economy predominated. In contrast with this, middle Neolithic cultures of Peiligang and Yangshao in the Central Plain have revealed huge hamlet sites, finely polished

stone implements for hoe-cultivating agriculture, pottery and bones of domestic animals to evidence the existence of a prosperous agricultural society.

During late Neolithic times, remarkable cultural progress was underway in the Central Plain; remnants of fortresses and bronze foundries from Longshan-type sites exhibit the transition from Stone Age to Bronze Age, from barbarous to civilised. The Hua'nán region was behind by one to two millenniums, evidenced by the initial emergence of stone farming implements in a late Neolithic site in Guangdong, and the coexistence of stone, bronze and iron artefacts as late a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various sites i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The leading and backwarding characters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 in Hua'ná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tempo of its agriculture. The ge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setting of the region favoured the growth of primitive mountainous agriculture in early Neolithic period but not the extensive hoe-cultivating agriculture of later times. Contrarily, agri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began sluggishly but later grew fast to take the lead. Since the cultural progress of a region is greatly affected by its agriculture, there is every reason why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Huanan region was far behind that of the Central Plain in the Pre-Qin period.